



楚国狂人屈原与
中国政治神话

Chu guo
kuang ren
Qu yuan

[美]劳伦斯·A·施奈德著

张啸虎 蔡靖泉译 张啸虎校

“楚狂人屈原”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典故。屈原是楚国的爱国诗人，他忠于自己的国家，忠于人民，但他的政治理想和抱负却得不到实现，他被放逐了。他忧国忧民，心系楚国，最终投江而死。屈原的这种精神和品质，被后人称为“楚狂人”。而“屈原”这个名称，也成为了中国政治神话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楚辞》中，屈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形象，他代表了楚国人民对自由、平等、公正的追求，对国家命运的关心和热爱。他的诗作充满了爱国主义情感，被誉为“楚辞之祖”。

楚国狂人屈原与中国政治神话

〔美〕劳伦斯·A·施奈德著

张啸虎 蔡靖泉译 张啸虎校

*

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通山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7.75印张 2插页 166 000字

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 800

ISBN 7-5351-0503-3/G · 393

定价：2.70元

原书内容提要

在中国文化中，“狂热”是与不肯同流合污而持有不同政见的人联系在一起的；它是对充满激情、富于幻想以及热烈追求一种理想的人的形象比喻。劳伦斯·A·施奈德以其视野广阔的研究，勾画出了中国传播最久和最有争议的狂人之一——传奇式的中国南方诗人屈原的形象。两千年来，作为艺术形式的、民间传说的一种独特传统，以及政治性的学术争论，都一直是围绕着这个富有浪漫色彩的形象展开的。在中国南方，人们以丰富多彩的龙舟竞渡活动来纪念他的投江自沉。

在古典时期，屈原以他所创作的优美抒情诗歌和他所具有的坚持政治理想至死不悔的精神而受到崇敬。

20年代的“新文化”革命时期，年轻的知识分子们都视屈原为勇于向世俗挑战的艺术天才的代表，认为他是他们的道德上的超人和身殉国难的先知。在当代，屈原在人民共和国已被官方转化为革命的人民诗人，并被卷入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中国历史性质的争论之中。

施奈德先生以其在民间文学、历史编纂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面的学术造诣，在本书中重新整理了所有的各种围绕着屈原的有关传说，从而使读者第一次得以全面了解这个同时包含了民间文化与上层文化的、富有生命力的传统。他在

本书中所论述的中心内容是：屈原是怎样以及为什么成为那些受西方浪漫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影响的现代知识分子的最高典范的。他认为，对于他们来说，屈原代表着革命浪漫主义的、持不同政见的与艺术创造力的本国传统。他指出，其中心点是，对于个性与自我意识的追求——在旧社会的一种艰难而热烈的追求，在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也是大致相同地存在着的。

“我不能理解，为什么在毛泽东时代，人们竟如此热衷于歌颂屈原。这说明了什么呢？我不能理解，为什么在毛泽东时代，人们竟如此热衷于歌颂屈原。这说明了什么呢？我不能理解，为什么在毛泽东时代，人们竟如此热衷于歌颂屈原。这说明了什么呢？”

“我不能理解，为什么在毛泽东时代，人们竟如此热衷于歌颂屈原。这说明了什么呢？我不能理解，为什么在毛泽东时代，人们竟如此热衷于歌颂屈原。这说明了什么呢？我不能理解，为什么在毛泽东时代，人们竟如此热衷于歌颂屈原。这说明了什么呢？”

屈原，两千年前的中国诗人，他的诗作《离骚》、《九歌》等，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珍品。他那“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精神，激励着无数仁人志士。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屈原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逐渐被淡忘，他的诗作也失去了应有的光彩。直到近现代，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屈原才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他那独特的诗风和深邃的思想，再次闪耀在世界文学的舞台上。

屈原，走向西方世界

译校前言

张啸虎

当我们读到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劳伦斯·A·施奈德教授所著的这本论我国古代诗人屈原与政治神话的书时，引起了强烈的兴趣，觉得别有一番风味，颇具不少可资借鉴之处，确有译出介绍的价值。当我把其中部分章节译完，并把全书审校完毕之后，觉得还有必要在译文前面说几句话。这是又一次表明，屈原，不仅是属于中国的，确实也是属于世界的。这位美国学者在80年代推出的这项研究新成果，又一次从不同侧面印证了苏联著名汉学家费德林教授在70年代所提出的关于“屈原诗歌的独特性与全人类性”的命题。同时还可以看出，植根于我们民族土壤中的“屈学”与“楚辞学”，正继续在西方土壤上移植，开花结果。

屈原及楚辞自诞生以来，对我国文学发展的推进，乃至对我国文化和历史发展的影响，都是很深远的。而自西汉以来的两千余年间，研究屈原和楚辞的学者及其著作，也可谓洋洋大观，这不仅在我国乃至在世界的文学史和学术史上，都属罕见。因此，以研究屈赋为中心的楚辞学，在我国历来

就属显学。逮近代以来，不少学贯中西之士，逐渐引进西方的学术观点与研究方法，从事对屈赋与楚辞的广泛探讨，因而取得新的进展和成就。建国初期，屈原被列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我国和各国学术界展开隆重的纪念活动和深入的研究工作，使这位中国古代伟大诗人，在世界文苑放出更绚丽的光采，引起国外学者的热切关注。

此后，对屈原和楚辞的研究，在我国出现了断层和曲折的现象。从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中期，在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中，学术界动荡不安，步履艰难，特别在十年动乱中，整个文化界都遭厄运，即屈原亦未能幸免。但是，尽管这位诗人的“亡灵”也曾成为某些人手中的“魔杖”，而其不朽的精神遗产，则总是屹立于天地之间，保持着固有的价值。在此期间，国外学者对屈学和楚辞学的研究，在继续深入发展中，并逐渐出现新的走向。

80年代以来，随着政治上和文化领域的拨乱反正，学术振兴，争鸣成风，屈学和楚辞学的研究，也开始了新的发展阶段。1982年端午节在历代相传的屈子故里秭归，举行了首次全国性的屈原学术讨论会，标志着一个新的起点。1984年，屈子沉江之日，全国屈学界代表又集会于荆州古城，正式成立中国屈原学会，日本学者稻田耕一郎教授也应邀莅会，为中外学术交流进一步开辟渠道。此后，相继在大连、成都、杭州、岳阳举行了五次屈原及楚辞学术讨论会，涌现出大量论文，先后编辑出版了《屈原研究论集》（长江文艺出版社）与《楚辞研究》（齐鲁书社），其中不乏创见，或出先贤之上，是颇使人感到欣慰的。概观近年来中外学者研究屈原及楚辞的一个重要趋向

是，大都在各方面以纵横贯通的方式，对屈学及楚辞学作广泛而深入的再认识与再评判。国内学者则力图借助从西方引进的文化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神话学、精神分析学、心理学，以及各流派的文艺理论与美学思想，并运用各种新方法与传统方法相结合，观念有所更新，视野不断开阔，因而取得了新的进展。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对屈赋和楚辞及古典文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者，也亟望了解西方学者是怎样在这个领域开拓和深化的，以期广泛交流，而能相互促进。也正是出于这种目的，我们特译介施奈德教授的这本新著。虽然我们并不完全同意作者的某些观点，也不是认为他所用的方法都是可以搬用的，而是觉得从中可以多少窥见西方屈学与楚辞学的动向，而且其所提出的问题也大都能启发思路的。特别是他站在古今中外广泛的文化视野上研究屈原这个特殊人物及其对历代学人的影响，读读它，也许对我们今天反思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认识传统的昨天、今天乃至明天的流变轨迹与规律，有一些有益的启发和借鉴作用。

本书原题为《楚国狂人——忠与谏的中国神话》(A Madman of Ch'u: The Chinese Myth of Loyalty and Dissent)，大体概括了全书的主旨。所谓“楚国狂人”，是作者加给屈原的“绰号”。其中“dissent”一词的本义，应是“持异议”或“有不同政见”，在英国则特指“不信奉国教”而言。考虑我国独特的历史传统，特别是针对屈原的具体情况，实质上是表示臣对君的谏诤。作者在封面书题的上端，特意标引法国19世纪激进派政治家埃米尔·查梯尔·阿兰(Emile Chartier Alain, 1868—1945)的名言：“既要服从，又要反对，这就是全部奥秘所在。”

(To Obey but to resist, There is the whole secret.)这也反映了作者对“loyalty and dissent”的一种看法，借以表明封建国家中臣对君的基本关系，也是“忠”与“谏”的奥秘所在吧。因此，我们认为，把书题改为《楚国狂人屈原与中国政治神话》，更能集中体现此书的内容与主题，也符合我国读者的接受习惯。

在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广阔背景下，深入探讨屈原传说在各个演变时期的政治机制，相应考察屈赋及楚辞所开拓的文学传统，是施奈德教授此书的一个重要特色。同时，其以此为中心而贯通古今的基本论题，则是描述屈原性格及其作品中所沉淀的中国文化质素，并结合评说“屈原型”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作者在本书《导言》中指出：通过对屈原及屈赋的文化背景的探索，可以了解以中国文化模式为基础的中国文明中某些长期存在的问题，并提供一个渠道，以解释关于中国文化特定领域内的连续性及其变化的若干轨迹，其中特别是士大夫阶级与知识分子一直同全部中国历史共命运的演变过程及其所引发的历史反思。另一位美国汉学家杰罗姆·B·格里德尔 (Jerome B·Grieder) 教授在评论此书时就说：

如果我们要“严肃地”把握中国（在其历史的任何一点上，包括其现在），那末，我们就要了解和评价，中国人过去和现在所严肃地把握的是什么，而这种严肃性又是为什么和怎么样表现的，其过去和现在的自我意识是什么，过去和现在是用什么方法作出判断的。全部都是高调的法则，而又具有惊人的的重要性。

施奈德所著的这本书，就是在在这方面所作的巨大贡

献。其中的主题，集结于这样的争论点：责任、个性、死亡、时间的负担，个人目标感。而他所探索的形象、象征、传说及节庆仪礼，都是这种了解的丰富源泉。他所研究的历史编纂尺度的那种方法，本身就是揭示在各种不同层次上的文化表现中长期存在的偏向。

从这段话中，也可以体会《楚国狂人屈原与中国政治神话》这本书中所充溢的历史感与文化意识。作者施奈德本身是纽约州立大学的历史学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研究，颇有造诣，也是《顾颉刚与中国新史学》一书的作者。他以历史学家的功力与眼光，企图从屈原身上所体现的忠与谏的矛盾统一性的破译神话，作为了解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渠道，这确有独辟蹊径之感。历史人物的神话化与神话人物的历史化，本是我国古典文献中的一个显著特色。从司马迁到郭沫若，从古代到现代，在各种学术著作与文学创作中，几乎都是用历史与神话的双重素材，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以塑造和丰富屈原亦人亦神的形象的。本书作者以西方和他本人对神话的理解，概略而系统地勾勒出这样一条历史的线索，有助于启发我们的思路。

对我国历史上和文学中的“狂人”的审视和剖析，也是本书中颇有见地和引人入胜的篇章。作者从中西文化的比照中，把“狂热性”(madness)分为两种有联系的和相补充的趋向或类型。一种是策略上的“佯狂”，如我国著名的楚狂接舆和魏晋之际的诗人阮籍，都是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所施远灾避祸之计，又如哈姆雷特在激烈的权力角逐中用为赢得时间的方法，亦属此类。另一种则为“狂热情绪”(mad-ardour)，这是这类“屈原型”人物的共同心态，作者又举

法国15世纪誉称“圣女”的民族英雄贞德为例，认为也具有这种气质。他还列举一系列的中国诗人和文学家，其中很典型的是自称“我本楚狂人”的李白。从作者对以“楚狂屈原”为代表的狂人形象的系统分析，可以窥见其中充溢着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广内涵，并反映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

在我所接触的国外研究屈原和楚辞的论著中，大体可分为三种模式。一种是苏联式的，如费德林教授所撰《屈原辞赋垂千古》、E·A·谢列勃里雅可夫教授所撰《屈原与楚辞》，以及匈牙利汉学家F·托凯(Ferenc Tokei)论《屈原诗派及其对中国诗歌的影响》之类，都着重从诗歌本身探讨屈赋及楚辞的艺术价值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另一种是日本式的，则在考据、训释、结构与体裁剖析诸方面作出不少贡献。如藤野岩友教授《楚辞解说》、竹治贞夫教授《楚辞的二段式结构》、稻畑耕一郎教授《〈楚辞·离骚〉错简献疑》，都属这类代表作。总的来说，这两种模式的学术视野与研究方法，大体仍未远离我国屈学与楚辞学的传统藩篱，也可同国内学者互相切磋的。第三种则是西方式的。施奈德教授的这本新著，大体反映美、英、法、德各国汉学家研究屈原与楚辞的共同走向。早在50年代初，美国哈佛大学詹姆士·R·海陶玮教授《屈原研究》中，就论及中国君主政体中君臣间微妙关系的内在机制，也可视为“忠与谏的政治神话”说的滥觞。又如英国汉学家戴维·霍克思(David Hawkes)所撰《“求宓妃之所在”》、法国汉学家戴密微(Poul Demieville)《道家的谜》、德国汉学家卫德明(Helmut Wilhelm)《(天问)浅论》，等等，大都是从

广泛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领域，深入探讨屈原的政治生涯与文学事业所以形成的内外因素，或者反过来，从屈赋及楚辞的产生土壤及其形成条件，进而考察中国文化的民族特性及其意识形态的演变过程。我们所译介的这本书，显示了这样的特点，堪称西方模式的代表作。

在翻译中，我译出“导言”及第一、第二两章，蔡靖泉同志译第三、第四、第五各章及“结束语”，全书由我校审定稿。原作者的中国文史知识相当渊博，征引大量的从古代到现代的文献资料，涉及文学、哲学、宗教、历史、民俗、神话等方面的各种典籍和学术论著，还援引许多有关的诗赋文章为例证，又广泛运用西方学者和我国现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都反复查对原著，一般都全照原著或原作抄录，以免失真；除把作者所作注释数百条全部译出之外，必要时还加译者注，以互为补充。原作者所引中国古籍繁富，而历年来整理重印的版本较多，且偶有出入，特就译者浅见择其一种，并在引文下端注明出处，以供参照。

原书附图很多，因制版困难，且多系国内所能见，故均从略。国外学者的思维方式与文字表现方式，当然有其固有的特点与风格，我们尽量保持原作精神，亦力求适应国内广大读者的接受习惯和我国文字的基本规范。终因我们水平有限，未能完全达到这类要求，且或有舛误之处，敬请海内外方家指正。

当译者参加1988年农历端午节在湖南汨罗举行的中国屈原学会第三届年会及第五次全国楚辞学术讨论会时，在会上简要介绍译稿，与会者极感兴趣，均以先睹为快。承湖北教育出版社大力支持，得以早日问世；特别是责任编辑徐耀明

同志认真审核，谨此致谢。

敬爱的王任重同志：感谢您的审阅。对我的文章

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帮助我修改，使我受益匪浅。

目 录

原书内容提要	1
屈原，走向西方世界（译校前言）	张骥虎 1
导 言	1
屈原	2
民间传统习俗	6
屈原在后古典时代的文学传统中	7
二十世纪	8
神话与历史	10
三位一体的主题	12
第一章 遭忧：神话的古典基础	17
传记与争议	18
《离骚》赋	31
贤士画廊	36
小结：卿大夫、君王与权力	41
第二章 一个少数派：忠与谏的传统	46
兰与菊	51
诗人：国民与个人	53
悲伤的南方	57
反“反离骚”	68
续《离骚》	77
小结	82
第三章 人与超人：屈原在中华民国时期	85
以身殉国	88

北方与南方	92
超人性	103
被束缚的普罗米修斯：郭沫若的屈原	109
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闻一多的屈原	119
第四章 夏节：屈原在民间传说中	124
夏节与凶日	128
水上仪典：奉祭溺死者	129
谁在五月五日溺水身亡	132
长命缕	135
粽子	137
龙舟节	137
小结：屈原在俗与雅的传说中	144
第五章 阶级特征：屈原在人民共和国时期	151
1953年的纪念活动	153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	156
人民性与大众化	159
阶级特征	165
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	167
从儒家到法家	175
屈原的抗秦斗争	179
小结：历史、个人意志和大众意志	181
结束语	187
形式、内容及其相互关系	187
一个变化着的自我意识和个人意识的范例	189
调和的方式	196
注释	200

导言

本书是对中国政治神话学的研究。其主角是古代的官吏兼诗人屈原(公元前338—前278年)——南方强国楚王朝的高级阁僚，政治忠节的楷模，献身国事的典范。其中心主题则是个人在政治上的地位和个人感情与臣民职责的关系，效忠而谏诤的可能性及遭屈辱而作抗争的必要性。

正如长江之流横贯中国的广大地区那样，关于屈原的神话在中国历史上也从公元前2世纪的古典时代一直流传到现代。又正如长江流域标志着中国南方文化的范围一样，关于屈原的神话（江河在其中具有重要地位）也促成着（中国）政治与文艺上的南方模式。神话学的领域，不仅广泛扩展于历史时间与文化空间，而且把我们引向对中国“大的”和“小的”传统之考察。屈原的传说，遍及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地区性的与全国性的文化。而且，这就有可能以大量可信的细节去论证这种内涵丰富的神话学，从而提供难得的机会，去了解以中国文化模式为基础的中国文明某些长期存在的问题。此外，神话的源远流长及其传说的丰富性，也提供一些渠道，以解释关于中国文化特定领域内的连续性及其变化的一些问题，其中如士大夫阶级与知识分子一直同全部中国

历史共命运的趋向。

我主导的兴趣原是在于了解，屈原在20世纪的传说，会告诉我们关于新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他们被扭曲的国民责任感和政治目标是什么。而为了把这种20世纪的传说置于整个屈原传统的格局内，并加深我们对前现代问题的理解，因此，我的研究是从对汉代（公元前206—公元220年）神话的古典文献的详细分析开始的。然后，我就转向从汉代到20世纪之间的神话转变，并进而考察民国时期（1911—1949年）神话中的改造形态。后者将着眼于现代知识分子所特别关注的事情和问题，他们自觉地试图用传统的文化模式以达到一种共同认识的新的一致性。

虽然自公元6世纪前后即已开始以屈原为中心的民族传统，但是，在我开始对20世纪中传说的分析之后，我才讨论那些传统。我之所以如此，是为了给读者提供关于屈原在知识分子的文学传统中一种连贯的阐述和分析。我遵循这个计划，也是因为以屈原为中心的民族传统，已成为现代知识分子以新的认识作自觉斗争的一种内在联结部分，特别是1949年之后是如此。对这项研究的最后探讨，则是屈原神话的活力在人民共和国的恢复及其变易状态，这是由于人民性、历史唯物主义的强制贯注，以及不断革命的教条所导致的。

屈原

有关处于神话中心的三闾大夫屈原最早的和最基本的故事，只留存极少量的细节。屈原是楚王朝中的最高官员之一。他所生活的年代，正是著名的战国时代（公元前403—

前221年)——称雄诸国流血争霸，各自试图吞灭对方的动乱时代。中国古老的封建(分封诸侯)制的政治经济特权，在弱肉强食的角逐中，正在迅速崩溃，而趋向于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和所有各王朝的统一。在贵族统治秩序的残砖碎瓦间，已开始显示官僚政治的破土而出，并已提出“才德兼备的贤人政府”的标准。

在屈原故事的最早层次中，他被描写成为达到他的时代高度的一位人物，他献身于在他所属王朝旗帜下的统一天下，并高度评价贤人在朝的意义。但是，不久之后，他的故事又把他的命运列于千古英杰之串，这就有可能使中国政治家们与他神会于百代。在朝廷，屈原的权力与其得到楚王的信任，为一群谗佞之徒嫉妒，他们中的若干人则是叛国者。佞臣们使用谣言诽谤的武器，离间楚王对屈原的宠信，并把他排挤出朝。然后，由于屈原坚持的与戏剧性的自卫，他们又促使楚王把他放逐到南楚未开化的滨河山野地区。屈原出于他兼对楚王和楚国的忠诚，以及对于他的“贞洁”及其理想正确性的自信，试图对朝廷进行苦谏，并公开地表达他的决不妥协的意见。尽管他明白朝廷对待他极不公正，但是，他拒绝离开他的故国，到其他一些王朝去寻求庇护和个人的利禄。在他那个时代中，象这样的游说列国是很普遍的，即如孔子这样的贤圣，就是侍食诸侯的先行者。最后，楚王被那些曾攻击过屈原的党人所背叛。当楚王受到蒙骗，而被敌国所杀害时，就是楚国衰亡的开始，不久即受侵略，并被吞并。君王的屈辱结局和首都的毁为废墟，使屈原受到沉重的打击。他以自沉汨罗江而结束他的生命。

屈原故事的关键之处在于他的诗歌作品，据认为是他流